

改写理论视角下《红楼梦》中建筑名称英译研究

——以杨宪益夫妇、霍克斯译本为例对比分析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Architecture Nam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Taking Yang Xianyi and His Wife and David Hawkes' Version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陈瑶

Yao Chen

天津财经大学

中国·天津 300350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350, China

【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经典名著之一,其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学者。《红楼梦》中的建筑名称承载着丰富的建筑文化内涵,它们的英译促进了中华建筑文化的海外传播。论文旨在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对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两个译本中的建筑名称翻译进行举例对比分析,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Abstract】*A Dream of Red Mansion* is on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it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ttracted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he architecture nam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carry rich architectur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ir English version promotes the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This thesis aims to use the rewriting theory of Lefever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of architecture names in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 translated by Hawkes' and Xianyi and his wife, so as to le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oing out to the world.

【关键词】改写理论;《红楼梦》;建筑名称;英译本研究

【Keywords】rewriting theory; *A Dream of Red Mansion*; names of architecture; English version study

【DOI】10.36012/sde.v2i3.1577

1 引言

一直以来,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红楼梦》(以下简称《红楼梦》)中所蕴藏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宗教文化都表现出极大兴趣。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建筑文化因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起居所及公共、宗教场所的描述而得到展现。正如学者所说:研究建筑的可以在大观园中读出一部建筑史^①。数以百计的建筑名称被赋予了特定的思想意义和文化内涵,正是这些形态各异的建筑让众多外来游客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通过对两个《红楼梦》全译本中建筑名称的翻译进行比较,探讨这两部经典译本中建筑名称英译的方法和策略,让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走出去。

勒菲弗尔将翻译文化研究的操纵理论继承并发展为一种改写形式,并受到三个重要因素制约:赞助者、意识形态和诗

学。对勒菲弗尔来说,意识形态是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指的是译者或被赞助者强加的意识形态^②。研究者可以从这三个制约因素中认识到制约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外因素。内在因素指的是译者、批评家等专业人员,他们根据文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对作品进行改写,并因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适应这种制约。外部因素是赞助者,他们有权促进或阻碍创作和翻译,即赞助者象征着控制或处置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权力。换言之,赞助者对文学意识形态更感兴趣,而那些专业人员更关注主流诗学。

2 从改写理论角度看《红楼梦》英译本中建筑名称的翻译

《红楼梦》中的建筑是文学塑造空间和意境的重要手段。这些建筑名称的翻译必须从改写理论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加以考虑,才能有效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2.1 《红楼梦》英译本中内在因素影响下的建筑名称翻译

杨宪益出生在文学世家并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虽然是英国人,但她在中国度过了童年生活。在牛津大学获得汉语荣誉学位的她结婚后回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翻译了《红楼梦》等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然而,霍克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却与杨宪益夫妇不同。霍克斯虽然是一位著名汉学家,但很少有译者将语言和文化运用到与其母语文化水平相当的地步。这使得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英语及其相应文化的支配。因此,杨宪益夫妇(以下简称杨)与霍克斯(以下简称霍)在处理建筑名称翻译时受内部因素影响很大。下面以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起居住所名称翻译为例进行研究。

例一:怡红院

怡红是指院子的主人贾宝玉和姑娘们相处得极好,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写诗、赏花。红色不仅是《红楼梦》的主色调,也是女性形象的代表色;红色不仅是贾宝玉最喜欢的颜色,也是作者所赞赏的颜色。杨直接将怡红院译为 Happy Red Court^[3],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红色情结。从原始社会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对红色充满特殊的情感。红色不仅是强大、崇高和力量的象征,也是美丽健康和自由快乐的象征。然而在西方红色却带有贬义色彩,常常与危险灾难等相关。因此霍将其译为 House of Green Delights^[4]。霍用在西方象征生机活力的 green 代替 red,更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认同。

例二:潇湘馆

潇湘馆为潇湘妃子林黛玉的居所,其代表性的斑斑竹林寓意着娥皇女英的神话。杨将其译为 Bamboo Lodge,这在一定程度上寓意着居多愁善感的性格和高贵典雅的人格。这样的改写不仅有助于还原主人公的个性特征,也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主人公悲哀传奇的一生。因此,杨的翻译可以唤起读者对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潇湘典故的这一历史联想。霍将其翻译成 The Naiad's House。Naiad 是生活在泉水和湖泊中的希腊水神,常被描绘成美丽、开朗、仁爱的女神形象。西方国家是完全熟悉这一形象的,这为西方读者提供了阅读的便利,但并不能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便可以看出文学系统内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杨宪益夫妇深受中国文化这一母语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在翻译《红楼梦》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立足点,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展示强大的文化魅力。而霍克斯本人则用西方文化作为母语文化,一定的文化优越感使他的意识形态在翻译《红楼梦》时会照顾到母语文化读者的审美习惯和

阅读心理。

2.2 《红楼梦》英译本中外来因素影响下的建筑名称翻译

出版社这一外部因素对作品翻译的影响不容忽视。当时,霍克斯的出版社是企鹅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由市场需求驱动的。出版物市场的发展需要以读者为中心,满足英文读者的文化期望及阅读偏好。而杨宪益夫妇的出版社是主要从事外语出版的外文出版社,其目的是系统公开地介绍中国文化。此外,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翻译有着重大影响。当时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红色研究的。《红楼梦》的主题被认为是满族统治者内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红楼梦》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是出版社的出版说明^[5],人们从中可以意识到赞助商一定的影响力。下面以两个宗教场所的名称翻译为例进行研究。

例一:地藏庵

地藏是佛教中掌控阴间的菩萨,至孝和大愿的美德在佛教中广为流传。杨将地藏庵译为 Ksitigarbha Nunnery,在这里,Ksitigarbha 是梵文名称。对于仰慕佛教的读者来说,他们熟悉这一形象,这有助于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但对于那些尊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读者来说,他们面对的更多是一种陌生感。霍把它翻译为 Convent of the Saviour King,因为目标语国家的读者不了解地藏菩萨而霍克斯把它翻译成一个救世主。使得即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也能够明白地藏在中国佛教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容易使西方读者接受并减轻其阅读负担。

例二:清虚观

《红楼梦》中提到的清虚观是道士修行、操纵仪式的场所。杨知道清虚观是献给道教和佛教诸神的,因此译文是 Ethereal Abbey。Ethereal 的字面意义是虚幻缥缈的,而清虚这两个词有着纯粹和不作为的含义,这符合中国人对道教的理解。道教崇尚自然和平,提倡清静无为。然而西方文化缺乏对道教文化的认知,因此在霍的翻译中,清虚观被译为 the Taoist Temple of the Lunar Goddess。霍了解道教有阴阳的说法,而 Lunar 有月亮的意思,其阴晴圆缺正与道教文化中的阴阳变化相契合。因此他用 Lunar Goddess 来表达月亮意味着阴的文化,以指代道教的主张。同时,西方读者对月亮女神这一形象也颇为熟悉,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所表现的文化隐喻及内涵。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可以认识到赞助者这一外部影响因素更注重作品的意识形态部分,是目标文化权威的代表。企鹅出

版社对中国传统作品很感兴趣,且西方国家在那个时代一直提倡平等、自由、解放等。霍克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翻译了这部经典作品,也就是说,企鹅出版社在翻译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杨宪益夫妇则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旨在将中华文化流传出去。因此,他们在翻译时必须研究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更加忠实于原文。综上所述,外部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

3 结语

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中建筑名称翻译的比较分析,可以认识到内外因素在改写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杨宪益夫妇在翻译中更加注重翻译理论的内在因素,主要是将中国文化传播给目的语读者。对于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建筑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更为翔实和具有参考价值,但也给西方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而霍克斯更倾向于运用改写理论的外部因素,更注重读者对外来语文化的理解和反应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减

少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激发大多数西方读者阅读《红楼梦》的兴趣,但不利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总之,改写理论采用描述性的方法,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学习翻译,并更加关注目标话题,其作用不容小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对各种翻译作品进行翔实的分析,并认真考虑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对改写理论的影响,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走出去搭建中西文化的沟通桥梁,从而翻译出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王银全,杨乐.《红楼梦》英译与中医文化西传[J].中国翻译,2014(4):108-111.
- [2]周红民.意境能否翻译还是诗学观念问题——也答陈大亮博士[J],当代外语研究,2014(2):25-29.
- [3]Yang X. & G.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0.
- [4]Hawke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0.
- [5]沈炜艳,从服饰到神采[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上接第8页)

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高校可以通过开展有关中国文化的校园活动,如剪纸、书法、武术比赛等增加留学生关于中国文化的切身体验,使其尽快熟悉原本陌生的环境,激发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高校也可以鼓励留学生到当地社区开展特色走访活动,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与当地居民建立友谊。这些活动有助于留学生融入当地生活,更直观地体验中国的文化风俗和价值观念,缓解由于其文化背景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适应困难,增强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5 结语

来华留学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培养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不仅可以提高留学生教育的质量,而且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来华留学生呈现新的特征,体现在数量的快速增加和生源国别的多样化。未来研究可以依据留学生的国别和文化背景将其分类,探究来自不同文化圈的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此外,中国文化内涵丰富,覆盖范围广泛,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中国文化分为具体的节日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地域文化、服饰文化等维度,探索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

某一具体纬度的认同情况。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EB/OL].(2019-04-12) [2020-04-29].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 [2]郭金山.西方心理学自我同一性概念的解析[J].心理科学进展,2003(2):227-234.
- [3]Berry J W, Annis R C. Acculturative Stress: The Role of Ecology, Culture and Differentiation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74,5(4):382-406.
- [4]任迪,姚君喜.外籍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9):147-153.
- [5]任小华.对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美文化认同现状的调查研究[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7(6):35-41.
- [6]张国良,陈青文,姚君喜.媒介接触与文化认同——以外籍汉语学习者对象的实证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5):176-179.
- [7]李婧,谢佳.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基于文化视角下的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6(2):23-27.
- [8]肖耀科,陈路芳.在中国的东南亚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对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留学生的调查[J].东南亚纵横,2012(5):38-42.